

在康德与谢林之间： 《资本论》“鲁宾难题”新解及其当代意义

谢亚洲 黄 涛

【摘 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抽象劳动的理解具有生理耗费与社会建构的双重维度。苏联学者鲁宾认为这种理解蕴含着内在的张力,如何解释它构成了“鲁宾难题”。这一难题深刻地指出了劳动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指向了马克思对李嘉图与贝利的超越。因此,解答此难题就关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合法性。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鲁宾借助于形式与内容相同一的方法论提供了一种近黑格尔的解答路径,但却因为仅仅肯定抽象劳动的社会建构维度,制造了掩盖矛盾的封闭体系。而借助于谢林的黑格尔批判可以看到,“鲁宾难题”所揭示的内在张力其实指向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马克思对“价值形式何以可能”的追问则为超越资本主义打开了思想缺口。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论》;“鲁宾难题”;德国古典哲学

【作者简介】谢亚洲,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代资本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E-mail:xieyzh@lzu.edu.cn;黄涛,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E-mail:453207842@qq.com。

【原文出处】《科学·经济·社会》(兰州),2023.3.40~53

【基金项目】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定向探索——优秀青年科研创新项目“技术与资本融合视域下新帝国主义发展趋势研究”(21LZUJBKDYDX052);甘肃省优秀研究生“创新之星”项目“《资本论》视域下‘驾驭资本’的路径研究”(2023CXZX-042)。

在《资本论》中,抽象劳动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而马克思对其理解具有生理耗费和社会建构的双重维度^①。苏联学者鲁宾认为超历史的生理耗费显然对立于历史性的社会建构,所以如何解释马克思的这种理解就构成了“鲁宾难题”(Rubin's Conundrum)。“‘鲁宾难题’揭示物质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复杂关系,关系到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定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的核心问题。”^②借助形式与内容相同一的方法论,鲁宾提供了一种近黑格尔的解答路径,其实质是将生理劳动排除在价值生成之外,而单方面地肯定抽象劳动的社会建构维度。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实际上制造出了黑格尔式的封闭体

系,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值得注意的是,借助于“理性形式何以可能”之间,谢林晚期哲学承继康德哲学的“理性有限性”之思,不仅深入地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的非现实性,也在客观上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就此而言,在康德与谢林之间重思马克思的“价值形式何以可能”之问,将有助于更好地解答“鲁宾难题”。

一、“鲁宾难题”及其近黑格尔的解答路径

抽象劳动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概念。正是通过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准确区分,马克思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历史特定性。值得注意的是,马克

思对抽象劳动的理解具有生理耗费与社会建构的双重维度。在《资本论》中,他一方面认为抽象劳动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③,另一方面则认为它是“共同社会实体”^④。在鲁宾看来,马克思的这种理解蕴含着一种内在的张力,超历史的生理耗费显然对立于历史性的社会建构,如何解释这种理解就构成了“鲁宾难题”:

两种情况中只有一种是可能的:如果抽象劳动是人类机能在生理学形式上的耗费,那价值也具有物化的物质性(reified-material character)。或者价值是一种社会现象,那抽象劳动也必须被理解为一种与特定的社会生产形式相关联的社会现象。抽象劳动的生理学概念不可能与它所创造的价值历史特性相调和。^⑤

由此可见,通过揭示抽象劳动的双重维度所蕴含的内在张力,“鲁宾难题”深刻地指出了劳动的物质基础(生理耗费)与社会形式(社会建构)之间的关系问题。实际上,马克思在批判李嘉图与贝利时就遭遇了这一关系问题。他看到,正是因为犯了还原论错误,强调生理耗费的李嘉图与强调社会建构的贝利才会沦为资本主义的卫道士。但令人迷惑的是,这两个卫道士披着不同的外衣,表面上好像是截然相对的,要想破解其奥秘就必须细加考察。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第一章“论价值”中首先就采取了这样一个标题:“商品的价值或其所能交换的任何另一种商品的量,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而不取决于付给这种劳动的报酬的多少”^⑥。这里隐含的是李嘉图对亚当·斯密的批判,即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其所耗费的劳动量,而非交换到的劳动量(工资)。由此,通过交换到生产的视域转换,李嘉图实际上内化了价值决定的劳动要素,深化了劳动价值论。现在的问题在于,李嘉图虽然解密了价值形式背后的劳动内容,但却物化了社会劳动的资本主义分配形式,认为价值量取决于“劳动时间”而非“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在马克思看来,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是每个社会的必要存续条件,特定的社会形态就是围绕社会劳动的特定分配形式构造起来的。这种构造遵

循节约与合理分配时间的原则:“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社会必须合乎目的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⑦显然,时间的节约是其合理分配的前提,而前者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以社会劳动的特定分配形式(即特定的生产关系)建基于生产力的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唯生产力论,即生产关系的变革并不是生产力充分发展的自然结果。相反,只要社会劳动能通过一定方式(如暴力革命)采取更为有效的分配形式,就可以反过来加速生产力的发展。

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资产阶级正是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通过商品交换的市场体系重构了社会劳动的分配形式,由此带来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⑧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其实是先天分裂的,只有经过交换的“惊险一跃”,前者才能转化为后者。交换所证成的价值量其实是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相应比例,而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这种劳动社会化过程毋宁说是“回溯性”的,并不是所有的“劳动时间”都能转化为决定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如果劳动产品不能被交换证明是“社会的使用价值”而拥有价值,那对象化于其中的劳动就会是无用功。

社会劳动的资本主义分配形式表明,劳动的社会性并不掌握在私人交换者手中,反倒是后者受制于劳动社会化的物化形式。“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⑨在这个意义上,商品这种“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仿佛拥有了自行建构社会关系的魔力。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⑩。在这种物化现象的遮蔽下,价值仿佛是单个商品在生产领域就能直接拥有的自然实体物。由此,李嘉图信奉的劳动价值论显然是“实体主义”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

而非“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以,李嘉图自然会混淆劳动的二重性,将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社会建构)混同于具体劳动(生理耗费)。这实际上是将生理劳动混同于价值,物化了劳动社会化的价值形式,从而自然化了资本主义社会。

李嘉图的实体主义价值理论引起了诸多争议。“触及了李嘉图学说的弱点”的贝利就认为,价值并不是如李嘉图所言的自然实体物,而是社会关系物,进而提出了关系主义价值理论:“价值只是不同商品相互交换的比例。价值只是两个商品之间的关系”^⑩。所以,价值并不取决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而是取决于交换到的商品。“因此,有千万种价值,有多少种商品,就有多少种价值,它们都同样是现实的,又都同样是名义的。”^⑪在一定程度上,这意味着亚当·斯密对李嘉图的复仇,交换领域对于价值理论的重要性再次被强调。现在的问题在于,虽然贝利正确地强调了交换领域的重要性,但这却是以牺牲生产领域为代价的。他没有看到的是,交换本身并不创造价值,“产品的高的交换价值并不是交换的产物,它不过是在交换中表现出来而已”^⑫。换言之,交换实际上只能表现价值,而非创造价值。如果像贝利那样将交换视为价值的唯一源泉,那就会将价值的表现形式(交换价值)混同于价值。由此,无论生产采取何种形式,只要有交换关系就会有价值。

但交换成为统治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有现象,只有生产采取资本主义形式,才会有普遍的商品交换关系,才会有“千万种价值”。尤为关键的是,普遍的商品交换关系只有在等价交换的情况下才得以可能。因此,尽管同一商品有不同的交换价值,但“这千万种不同的表现却都始终表示同一价值”^⑬。马克思认为,等价交换得以可能的同质基础是建基于生理耗费的抽象劳动。所以,没有生理劳动就没有抽象劳动,没有普遍的商品交换关系,没有变动不居的交换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强调交换的贝利是不折不扣的“拜物教徒”^⑭,因为他把资本主义社会形式视为永恒的前提,从而忽视了生理劳动在这一形式面前的独立性。

在李嘉图与贝利的视差中,马克思意识到,劳动

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形式不能相互还原,否则就会永恒化资本主义社会。就此而言,李嘉图的问题在于将生理劳动混同于价值,没有追问“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⑮,从而物化了社会劳动的价值形式。而贝利的问题则在于将交换价值混同于价值,“只看到这种社会形式的没有实体的外观”^⑯,从而忽视了为价值奠基的生理劳动。正是立足于这种视差,马克思在价值理论领域开启了全新的问题式,从而指向了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在这个意义上,解答“鲁宾难题”就关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合法性。那要如何解答呢?在这个方面,鲁宾本人首先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大胆引入黑格尔哲学的方法论,力图在形式与内容相同一的框架中解读马克思的价值理论。鲁宾明确指出:

不能忘记的是,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采取的是黑格尔的立场,而非康德。康德把形式当作与内容有关的外在物,当作从外部附着在内容上的东西。从黑格尔哲学的立场来看,内容本身并不是形式从外部附着的东西。相反,通过其发展,内容本身产生了早已潜存于自身中的形式。形式必定是从内容本身中生长出来的。这是黑格尔和马克思方法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其对立干康德的方法论。从这个观点来看,价值形式必定是从价值实体中生长出来的。^⑰

由此可见,价值形式不仅是与价值相区别的交换价值(价值的表现形式),还是与价值实体(抽象劳动)相同一的形式规定性——价值是价值形式与价值实体的统一体。值得注意的是,鲁宾明确地将价值形式视为劳动产品的特定社会形式。这就指向了价值的社会历史基础:正是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得价值成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形式。在这个意义上,价值形式的含义得到了扩展,不仅是价值本身的表现形式,也是作为形式的价值本身。但这两者并不是毫不相干的,反而处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中——交换价值是作为形式的价值本身的具体表现形式。这样一种区分使得价值形式具有了连接生产领域与交换领域的中介性作用:“这一‘价值形式’结

合了链条的两端: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与市场现象。没有价值形式,这两端就会彼此分离并各自发展成片面的理论。”^①换言之,如果没有认识到价值形式的中介性作用,就会在生产与交换之间各执一端,从而重蹈李嘉图与贝利的覆辙。

在此基础上,鲁宾区分了《资本论》中的分析方法(analytical method)和辩证方法(dialectical method)。前者遵循的是从形式到内容的分析路径:货币→交换价值(价值的表现形式)→价值(作为形式的价值)→抽象劳动(价值实体);后者则在前者的基础上遵循从内容到形式的辩证路径:抽象劳动→价值→交换价值→货币。立足于这两种方法的区分,鲁宾指出:“虽然从分析方法的角度来看,抽象劳动的生理学概念可以或多或少成功地站住脚,但从辩证方法的角度来看,它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因为人们无法从生理学意义上的劳动概念中获得任何作为劳动产品的必要社会形式的价值概念。”^②换言之,在鲁宾看来,尽管抽象劳动可以被分析地理解为人体生理机能的耗费,但超历史的生理劳动却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特定社会形式。因此,劳动的生理耗费维度显然应该被排除在价值生成之外,抽象劳动便被认为是一种纯粹的社会建构,而进行抽象的交换领域则成了价值的来源地。

二、在康德与谢林之间:现实事物的理性形式何以可能

立足于黑格尔哲学的方法论,鲁宾力图在形式与内容相同一的框架中解答“鲁宾难题”,深刻地批判了抽象劳动的生理学概念。但问题在于,过于强调社会形式蕴含着忽视物质基础的风险,进而极有可能掩盖二者之间的矛盾。在这个方面,鲁宾可以说是重蹈了黑格尔哲学的封闭化覆辙,“以流通领域的抽象统治及支配特性来掩盖更为深层的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决定性作用”^③。这就意味着鲁宾“以黑解马”的阐释路径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将差异封闭于同一之中。在抽象劳动问题上,鲁宾就因为过于强调价值形式的“同一化”力量,犯了矫枉过正的错误,从而忽视了这一形式所蕴含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历史前提。于是,价值形式一

跃成了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在形式与内容相同一的框架中玩弄着自己爱自己的思辨游戏。

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超越这种近黑格尔的解答路径。答案其实就藏在鲁宾所援引的德国古典哲学中,而被他忽视的谢林则是破局的关键人物。在这里,与传统观点相左,谢林并非介于费希特与黑格尔之间的过渡型哲学家,而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终结者。在这一点上,谢林的黑格尔批判是最好的例证。正是在与黑格尔的巨人之争中,“谢林首次发现了黑格尔以及整个近代理性只能理解思想中的东西,而不能从事物本身的潜能理解它”^④。换言之,如果像黑格尔那样将现实事物的理性形式视为必然,就会阉割事物本身的潜能,陷入理性的牢笼之中。

在强调整理性的有限性方面,谢林的黑格尔批判可以说是向康德的回归。这一点其实就体现在形式与内容(质料)的关系问题上:康德讨论的是外在于形式的纯粹质料(即自在之物),而黑格尔讨论的是与形式相同一的内容(即理性事物),谢林则立足于对黑格尔的深入批判,在更高的层面上回归了外在于形式的质料(即能在者)。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谢林晚期哲学在客观上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⑤。所以,深入分析康德、黑格尔与谢林在形式与内容(质料)问题上的争辩,将有助于“鲁宾难题”的解答。对于形式与质料的关系问题,康德明确指出:

它们是这样的两个概念,它们被置于所有其他反思之基础的地位,尽管它们与知性的每种使用都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质料意指泛而言之可规定者,而形式则意指其规定性……直观形式(作为感性的一种主观的特性)先行于一切质料(感觉)——进而空间和时间先行于所有显象以及所有经验材料——并且使得经验首先成为可能……该形式是独自被给出的……质料的可能性将一种形式直观(时间和空间)作为给定的东西预设下来了。^⑥

由此可见,在康德看来,源于自在之物的质料只有经过感性直观形式的中介才得以可能,所以人类只能通过经验认识自在之物的现象。这种观点是对“理智哲学家”(即莱布尼茨)的批判,他混淆了现象与

自在之物,所以将质料视为“诸显现着的事物自身”,而形式则被相应地认为是“诸物本身的规定性”^⑧。这就导向了“纯粹理性的独断论”,并在“纯粹经验论”的冲击下产生出二律背反。康德将二律背反视为理性僭越(即超验运用)的结果,所以为了避免矛盾,他坚持认为理性只能限于经验的范围内,在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之间划定了一条绝对的界限。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超验的自在之物如何能够进入感性直观形式之中,为主体提供后天经验性的质料?这种康德避而未谈的发生学问题使得质料(即自在之物与感性直观形式的综合物)概念成为独断的。原因在于,形式与质料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建基于形式与“纯粹质料”^⑨(即自在之物)的关系问题。而在康德那里,形式与纯粹质料是截然二分的,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自在之物能够表现为感性直观形式中的质料。力图避免矛盾的康德现在反而陷入了自相矛盾——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吊诡地成了认识的根据。

面对康德无力解答的质料发生学问题,黑格尔认为,所谓的自在之物根本就不是思维的绝对他者,而是“思维的产物”^⑩。就此而言,自在之物便不是认识的根据,而只是思维的主观设定。那么什么是认识的真正根据呢?黑格尔的回答是理性事物,因为“思想不单纯是我们的思想,而且同时也是事物和对象本身的自在东西”^⑪。现实事物之所以能够表现出适合于人类理性结构的一面,就在于现实事物本质上是理性事物,只能以人所能理解的形式表现自身。所以,理性形式是现实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而不是外在的。康德为了逃避矛盾所采取的二分法则遭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讥讽。在坚持二分的前提下,“‘纯粹’的无形式质料变成了其对立面,变成了一个有待接纳任何具体的、积极的、实质性的规定的空形式容器;当然,反之亦然”^⑫。换言之,没有规定本身就是一种规定,同时尚未具体化的纯规定本身其实毫无规定可言。由此,没有任何形式规定性的质料其实就是一种“空形式”,而纯形式因为需要质料才能具体化自身的规定性,所以它本身就是空无规定的抽象质料。这就是“纯有即无”的矛盾辩证法。

就此而言,黑格尔自然会批判康德逃避矛盾的做法,转而认为只有承认矛盾的本体地位才是对它的真正“解决”。现象与自在之物的二元对立就被黑格尔扭转为理性事物的内在区分,形式与纯粹质料的外在关系也被转化为形式与内容的内在关系。如果纯粹质料是外在于形式的“抽象他者”,那“‘内容’就是形式在其对立的规定中所设定的形式自身”^⑬。对此,黑格尔明确指出:

关于形式与内容的对立,我们主要应该坚持,内容并不是没有形式的,而是内容既在其自身中具有形式,同时形式对于内容也是一种外在东西。这样就有了双重的形式,它有时作为映现在自身中的东西是内容,有时作为不映现在自身中的东西则是外在的、与内容漠不相关的实存。在这里潜在地存在着内容与形式的绝对关系,也就是存在着内容与形式的相互转化,所以,内容无非是形式之转化为内容,形式无非是内容之转化为形式。这种转化是最重要的规定之一。但这种转化是在绝对关系中才被设定起来的。^⑭

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在这里区分了两种形式,其中的“外在形式”好像又退回到了与纯粹质料的关系中。但这种“外在形式”并不意味着内容本身是没有形式的质料,因为所谓的“没有形式并不是指完全不存在形式,而仅仅是指不存在适当的形式”^⑮。换言之,“外在形式”仍然是内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不过是无法充分展现内容的“不当”形式。在这两种形式中,黑格尔显然更看重与内容相同一的“适当”形式,认为二者之间是相互转化的绝对关系,“适当的形式就是内容本身”^⑯。这显然是将形式与内容置于对立同一的关系中。

现在的问题在于,为了促成理性体系的绝对充满,黑格尔实际上将形式与内容的矛盾运动强行封闭于理性的同一性体系之中。在他那里,不是“差异包含着同一”而是“同一包含着差异”——所有的矛盾都只是理性同一性体系中的内在矛盾。由此,“绝对理念辩证发展的永恒的生命,一切求真、求善的冲动,乃至生命的冲动本身也都完结了,都被窒息在他

的被完成了的体系之中了”^③。这实际上将现实事物的理性形式视为永恒必然的,“永恒的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理念永恒地作为绝对精神实现着自己、产生着自己和享受着自己”^④。理性现在就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万事万物都只能在其中显现自身,历史便在这种同一性体系中走向了终结。

但历史真的就此终结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囊括一切存在者的理性同一性体系实际上已经达至理性的极限处,“只有在这里,人们才会开始追问那个基于自身建立起来的理性”^⑤。在谢林看来,黑格尔的问题就在于将现实事物的理性形式视为不证自明的前提,而没有进一步追问这种形式何以可能,即理性形式的“发生学”问题。所以,毋宁说黑格尔哲学是“先天完成时”的先验哲学——位于起点的开端本身其实就是终点。形式与内容的矛盾运动便永远囿于理性的圆圈之中,现实事物只能在理性形式中呈现出来。“但实际上,理性的存在本身仅仅是某种有条件的东西,仅仅是某种肯定的东西。如果站在一个绝对的立场上,为什么不能说理性的对立面同样也是一个必然存在者呢?”^⑥这意味着,黑格尔的纯粹理性哲学其实无力解答“究竟为什么有某物存在,为什么无不存在?”^⑦“为什么是理性存在着,为什么不是非理性存在着?”^⑧就此而言,理性体系中的辩证运动并不是实存事物的现实性运动,而只是一种事后的思想“回溯性建构”。黑格尔哲学便是用思想反注现实的“思辨哲学”,根本无法触及现实事物的运动过程。通过批判黑格尔哲学的非现实性,谢林犀利地指出:

整个世界仿佛都是置身于知性或理性编织的重重网络之内,但问题始终在于,世界是如何进入到这些网络之内的,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很明显还有另外某种东西,某种相比纯粹理性而言多出来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有某种突破着这些限制的东西。^⑨

由此可见,谢林通过抓住理性形式的发生学问题,打断了理性同一性体系中的无限循环运动。但强调理性的有限性绝不是要抛弃理性,而是为建立在理性之上的宏伟体系奠基。这种奠基并不囿于理

性的框架内,毋宁说“理性的本原实际上是理性的他者”^⑩。在这种情况下,内容与形式的矛盾运动就转化为质料^⑪与形式的矛盾运动。作为理性的他者,这种“多出来”的质料在理性形式面前始终保持着独立性,它可以通过上帝意志的自由决断行动显现为理性形式中的内容,也可以不如此显现。可见,形式与内容虽然如黑格尔所言具有同一性,但同时也包含着无法消融的差异,因为质料并不是必然会被“塑形”为理性的内容。毋宁说,质料始终是理性形式所无法囊括的“剩余”,指向了“一个更为本源的源初差异”^⑫,蕴含着超越这一形式的可能性。由此,非同一性的矛盾便从理性的同一性体系中解放出来了,黑格尔式的“同一包含着差异”也被扭转为谢林式的“差异包含着同一”,从而敞开了历史的全新可能性。

三、“鲁宾难题”新解:社会劳动的价值形式何以可能

尽管马克思本人对谢林多有讥讽^⑬,但二人在思想深处却具有十足的亲缘性。如果说谢林追问的是“现实事物的理性形式何以可能”,看到了位于理性根基处的“理性的他者”,那马克思追问的就是“社会劳动的价值形式何以可能”,看到了位于自行增殖的价值(资本)根基处的“资本的他者”。在这个意义上,谢林的发生学追问可以说是一支解毒剂,有助于超越“鲁宾难题”的近黑格尔解答路径。

在马克思那里,抽象劳动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劳动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石:自然物质只有经过劳动的“塑形”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而“劳动,耗费人的一定量的肌肉、神经、脑等等”^⑭。基于此,马克思明确指出:

因此,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⑮

换言之,生理劳动因为能够制造满足人类需要的有用物,所以对于人来说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但与此同时,生理劳动也必须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下实现出来。就此而言,价值形式只不过是生理劳动社会化的资本主义

形式,抽象劳动也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因此,为价值奠基的生理劳动可以理解为谢林意义上的“质料”。正如质料在理性形式面前始终保持着独立性,生理劳动在价值形式面前亦如是——生理劳动可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呈现为价值形式中的价值实体,也可以不如此呈现。生理劳动对于价值形式来说就是一种无法抹去的“剩余”,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历史性。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时尤为强调生理劳动的重要性:

一般人类劳动,人类劳动力的耗费,虽然可以有任何一种规定,但它本身是不确定的。只有人类劳动力在一定的形式中被耗费,作为一定的劳动被耗费,它才能得到实现,得到对象化,因为同一定的劳动相对立的,只是自然物质,只是劳动对象化在其中的外界材料。只有黑格尔的“概念”才无须外界物质而自行客体化。^⑩

马克思的话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形式所特有的“一般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并不是脱离生理劳动的纯粹社会建构。相反,“不确定的”抽象劳动实际上建基于具体劳动“塑形”自然物质时所产生的生理耗费。在抽象劳动之中便蕴含着劳动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形式之间的张力:虽然价值形式统摄着生理劳动,但前者同时也依赖于后者。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将抽象劳动视为纯粹的社会建构,还是视之为单一的生理耗费,都只会遮蔽蕴含于其中的内在张力,从而物化资本主义社会形式。尤为关键的是,生理劳动和自然物质实际上是资本(死劳动)无法囊括的“他者”,而自然物质(生产资料)的价值只是在劳动过程中被转移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只能是耗费生理机能的活劳动。就此而言,毋宁说生理劳动是真正的“资本的他者”:它既是资本的源泉,又超溢于资本的掌控。

生理劳动的这种他者性表明社会劳动的价值形式不是必然的。事实上,虽然价值形式是从价值实体中生长出来的,但这种内在联系却是回溯性的——价值形式必须暴力“塑形”生理劳动才能得到与自身相统一的价值实体。而黑格尔的问题就在于将思想的“回溯性建构”视为现实事物的运动过程,从而将矛

盾封闭于理性体系之中。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非现实性方面,马克思可谓是谢林的学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⑪

换言之,黑格尔实际上是用思想反注现实,因为迷恋思想的“回溯性建构”而“陷入幻觉”,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⑫。但这种“先验的结构”绝不是不言自明的,它非但不能取代“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反而还依赖于后者。正如现实事物的理性形式是值得追问的,社会劳动的价值形式亦如是——价值形式无法穷尽生理劳动社会化的可能性。这样看来,“鲁宾难题”所揭示的内在张力并不是问题所在,反而就是答案所在。抽象劳动实际上是生理耗费(物质基础)与社会建构(社会形式)的对立同一(矛盾),指向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虽然力图超越有限的物质基础,以实现价值的无限增殖,但同时又离不开这一基础,否则现实就将以危机的姿态打断资本的疯狂舞步。

这种矛盾不是黑格尔式的内容与形式的矛盾,而是谢林式的质料与形式的矛盾——质料并不必然采取某种形式。要在抽象劳动问题上走出黑格尔式的“先验幻觉”,就必须追问价值形式本身的产生过程,即价值形式的“发生学”问题。这就是马克思探讨“原始积累”的缘由所在。他明确指出:

但是,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这整个运动好像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预先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⑬

马克思在这里看到,对“原始积累”的探讨是走

出“恶性循环”的解毒剂,正是这种积累构成了资本主义的隐秘“前史”。那么何谓“原始积累”?马克思的回答是:“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⑤换言之,资本的原始积累虽然的确是物质财富的积累,但首要是社会产权关系的根本性转型——资本不是物而是社会关系。

这里隐含的是对亚当·斯密的批判,因为他不假思索地将交换视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普遍“倾向”^⑥,并将利己的理性人视为历史的起点。由此,资本被物化为物质财富,资本主义便是“先定的”,早就以胚胎形式存在于封建主义的内部“缝隙”中。“预先积累”就会被视为建基于生产力发展的物质财富积累,其目的是打破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桎梏,解放蕴含于其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资产阶级则被认为扮演着救世主般的领导角色,“欧洲之所以能跨越式地进入‘现代’资本主义,主要是因为其资产阶级能以各种方式积累起充足的财富”^⑦。“在这一解释看来,与其说资本主义意味着与早期社会形式的质的断裂,不如说它是一种大规模的量的积累,即市场的扩大以及经济生活商业化特征的加强。”^⑧就此而言,所谓的历史实际上是“无历史”的。或者说,只存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即资本(物质财富)的逐渐积累所导致的商业化过程。黑格尔式的历史终结论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域内露出了自己的獠牙。

通过对原始积累的考察,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诞生并不是“量的积累”的结果,而是“质的断裂”的飞跃。单纯的物质财富积累并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毋宁说“是社会产权关系的转型最终促使财富转化为‘资本’”^⑨。这种根本性的转型意味着历史的断裂性和偶然性,所以资产阶级实际上不是命中注定的领导者。“工业骑士之所以能够排挤掉佩剑骑士,只是因为他们利用了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件。”^⑩这种“事件”就意味着,社会的根本性变革并不是生产力充分发展(即物质财富的逐步积累)的自然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于封建生产方式的中心之中,但它是相对独立的过程相结合的结果,这些过程可能不遭遇(encountered)彼此,也可能在不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遭遇彼此。”^⑪“资本

主义不是某种不可避免的自然进程的结果,故而它也不可能是历史的终结。”^⑫可见,虽然资本主义社会是从封建社会中破壳而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是“先定的”。毋宁说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解体是使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要素”(马克思语)而非其本身得到解放,从而揭示了这一社会形式的历史特定性。

既然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不是永恒的,那就必定有其他可能性。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分配形式呢?或者说,如何超越社会劳动的价值形式呢?如果按照传统的观点(即经济决定论),那必定会认为只要在现有基础上充分发展生产力,就能带来生产关系的彻底变革。换言之,这种观点“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设想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这一范式大致借助的,是蛇的隐喻。蛇皮一旦撑得太紧,就会蜕皮”^⑬。由此,历史仿佛会在生产力(内容)与生产关系(形式)的矛盾运动中自动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但问题在于,资本这种生产关系并不会放任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反而会竭力将其限制在价值增殖的范围内。更为重要的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这种‘物的依赖性’(经济因素占主导地位的决定论)并不是永恒的一般规律,人类主体的历史发展的本质是实践的辩证能动性”^⑭。经济决定论实际上将资本主义的拜物教现象泛化为社会历史的普遍现象,从而认为人类主体的革命运动只能消极地等待物质条件的成熟。这种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法显然是“黑格尔式的”(阿尔都塞语),预设了圆圈式的开端即终点:所谓的内容其实只是形式的“回溯性建构”,正如亚当·斯密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人”设定为历史的起点。

在这一前提下,如果坚持认为生产力具有优先性,就会窒息诞生新形式的可能性。由此,列宁和毛泽东所成功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不可想象的,邓小平所成功开启的改革开放也是不可思议的。而要走出这种困境,就必须看到生产力具有外在于生产关系的质料维度——生产力相对于生产关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超前或落后于生产关系^⑮。因此,可以

反过来说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而言具有优先性,即生产关系可以借助历史的偶然因素超前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并转而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但值得注意的是,生产关系的这种优先性是有限的:“不能无条件地,而只能在现有生产力的基础上并在它规定的客观限度内援引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优先性。”^②所以,强调生产关系的优先性并不意味着滑向了苏联式的唯意志论,一味强调生产力的优先性反而会像唯意志论那样窒息新生产关系的可能性。

四、结语

透过谢林晚期哲学的思想棱镜可以看到,“鲁宾难题”所揭示的内在张力指向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而马克思对“价值形式何以可能”的追问则为超越资本主义打开了思想缺口——价值形式实际上只是劳动社会化的历史特定形式。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可以理解为重构劳动社会化形式的伟大实践,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③与此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优先性是有限的,否则就会滑向肆意妄为的唯意志论。在这一点上,苏联模式的僵化与失败是惨痛的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创造性地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伟大结合,将资本的增殖运动限定于社会主义的框架内,“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④,有助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良性互动。但实践永远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如何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以更好地发展生产力,仍然是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⑤。

注释:

①马克思对抽象劳动的理解引发了诸多争论,参见 Werner Bonefeld, "Abstract Labour: Against Its Nature and on Its Time", *Capital & Class*, 2010, Vol. 34, No. 2, pp. 257-276.

②代利刚:《“鲁宾难题”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新解——兼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現象学维度》,《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91-10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4页。

⑤Isaak Illich Rubin, *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 Montréal-New York: Black Red Books, 1973, p. 135.

⑥大卫·李嘉图:《大卫·李嘉图全集》(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41页。

⑨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页,第127页。

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页。

⑫赛米尔·贝利:《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主要是论李嘉图先生及其信徒的著作》,1825年伦敦版,第39页。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7页。

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4页。

⑭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7页,第158页。

⑯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8页,第99页。

⑱Isaak Illich Rubin, *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 p.117.

⑲Isaak Illich Rubin, *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 p.121.

⑳Isaak Illich Rubin, "Abstract Labour and Value in Marx's System", *Capital & Class*, 1978, Vol. 2, No. 2, pp. 107-139.

㉑徐文越:《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近黑格尔阐释的空间与界限——以鲁宾、巴克豪斯和阿瑟为例》,《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4期,第157-166页。

㉒庄振华:《谢林与近现代思想中的质料主义》,《哲学评论》2017年第2期,第15-30页。

㉓“质料”和“物质”本来就是对“material”一词的不同翻译,关于谢林对马克思的影响,参见 Manfred Frank, *Der unendliche Mangel an Sein: Schellings Hegelkritik und die Anfänge*

der Marxschen Dialektik, Mü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 1992。

②⑤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韩林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364-365页,第365页。

②⑥谢林:《近代哲学史》,先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9页。

②⑦黑格尔:《哲学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梁志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6页,第101页。

②⑧Slavoj Žižek, *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 Kant, Hegel, and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35.

③⑨齐泽克:《延迟的否定:康德、黑格尔与意识形态批判》,夏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8页。

③⑩黑格尔:《哲学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第241页,第242页。

③⑪黑格尔:《哲学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第242页。

③⑫杨祖陶:《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页。

③⑬黑格尔:《精神哲学》,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49页。

③⑭瓦尔特·舒尔茨:《德国观念论的终结:谢林晚期哲学研究》,韩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

③⑮⑯谢林:《近代哲学史》,第310页,第309页,第173页。

③⑰这一始于莱布尼茨的经典存在之问,被谢林视为“最终的、充满绝望的问题”,参见谢林:《启示哲学导论》,王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8页。

④⑱王丁:《存在何以“不可预思”——谢林论理性的最终奠基》,《哲学研究》2022年第6期,第98-106页。

④⑲这里的“质料”不是康德意义上的预设了感性直观形式的质料,而是被谢林视为“质料因”的“能在者”(das Seinskönnende),参见庄振华:《略论谢林“肯定哲学”的思想史地位》,《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24-34页,111页。

④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69页。

④⑤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99页,第56页。

④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9页。

④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

④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页。

④⑩⑪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20页,第822页,第822页。

④⑬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④⑭⑮⑯埃伦·米克辛斯·伍德:《资本主义的起源:学术史视域下的长篇综述》,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页,第10页,第26-27页。

④⑰ Louis Althusser, *Philosophy for Non-Philosophers*, London &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7, p. 135.

④⑱埃伦·米克辛斯·伍德:《资本主义的起源:学术史视域下的长篇综述》,第27页。

④⑲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57页。

④⑳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似自然性、物役性批判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67页。

⑤①在自然条件优越的热带地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可以说是超前于生产关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86-589页。

⑤②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09页。

⑤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⑤④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0页。

⑤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11页。